

从军事防御到文化符号

——巴蜀少数民族碉楼寨堡的形制演变与功能转型研究

郝薇

成都文理学院, 四川 成都 610401

DOI:10.61369/MEC.2026010004

摘要：巴蜀地区的少数民族碉楼寨堡是极具地域特色的乡土建筑遗存，其发展历程清晰呈现了从军事防御工事向文化符号的转型轨迹。本文融合历史文献梳理与实地调研的研究方法，系统探讨了该类建筑的历史渊源、形制演变脉络及功能转型路径^[1]。巴蜀碉楼寨堡的形制演进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核心阶段：明清时期以军事防御为核心功能导向，清末至民国时期呈现功能多元化发展，进入当代后则完成文化符号化转型^[2]。以沃日土司官寨、麒麟坝古碉堡等典型遗存为例，它们既承载着军事防御的精巧设计与厚重历史价值，更清晰折射出建筑功能从“军事防御”到“居住空间”，再到“文化遗产”的递进演变特征。针对碉楼寨堡的保护与活化利用，应确立“活态保护”的核心理念，通过数字化建档留存、生态博物馆构建、文旅深度融合等多元路径，实现其当代价值的重构与再生。

关键词：巴蜀地区；碉楼寨堡；形制演变；功能转型；文化遗产保护

From Military Defense to Cultural Symbol: A Study on the Architectural Evolution and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Minority Watchtowers and Fortified Villages in Ba-Shu Region

Hao Wei

Chengdu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Chengdu, Sichuan 610401

Abstract: The minority watchtowers and fortified villages in the Ba-Shu region represent distinctive local architectural relics with strong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whos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clearly demonstrates a transformation from military fortifications to cultural symbols. This paper employs a research methodology that combines historical document analysis with field investigations to systematically explore the historical origins, architectural evolution, and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pathways of these structures. The architectural evolution of watchtowers and fortified villages in Ba-Shu can be broadly divided into three key stages: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hen military defense was the core function; the late Qing to Republican period, marked by functional diversification; and the contemporary era, which has witnessed a complete transformation into cultural symbols. Taking typical relics such as the Wori Tusi Official Residence and the Qilinba Ancient Watchtower as examples, these structures not only embody the ingenious design and profound historical value of military defense but also clearly reflect the progressive evolution of architectural functions from "military defense" to "living space" and then to "cultural heritage." Regarding the protection and revitalization of watchtowers and fortified villages, the core concept of "living protection"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their contemporary value should be reconstructed and regenerated through multiple pathways, including digital archiv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eco-museums, and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tourism.

Keywords: Ba-Shu region; watchtowers and fortified villages; architectural evolution;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引言

巴蜀地区素有修筑山城寨堡的历史传统，以钓鱼城、运山城为核心的山城防御体系，在宋蒙战争中构筑了关键的军事屏障，发挥了

项目信息：成都文理学院2025年校级科研项目《从军事防御到文化符号——巴蜀少数民族碉楼寨堡的形制演变与功能转型研究》成果，项目编号：WLYB202550。

作者简介：郝薇，成都文理学院，讲师，三级艺术创意设计师，助理工程师。

举足轻重的战略作用。尽管元朝统一后这类山城遭到集中拆毁，但寨堡建筑并未就此淡出历史图景^[9]。明清时期，每逢社会动荡之际，民众便纷纷修筑寨堡以图自保，进而掀起数次寨堡营建热潮。其中，巴蜀少数民族碉楼寨堡作为地域建筑的典型范本，凭借其独特的形制构造与多元的功能属性，成为研究西南地区民族史、军事建筑史及文化变迁的重要实物佐证。

近年来，伴随乡土建筑遗产保护意识的普遍提升，碉楼寨堡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议题。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单一案例或特定民族碉楼，如桃坪羌寨、丹巴碉楼等代表性遗存，但从长时段、跨区域视角出发，对巴蜀少数民族碉楼寨堡形制演变与功能转型展开系统分析的成果仍较为匮乏。本文立足历史演进脉络，融合建筑学、民族学与文化遗产学的多学科研究视角，旨在厘清碉楼寨堡从军事防御设施向文化符号转变的内在逻辑与外在表征，为巴蜀地区传统建筑的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提供理论支撑。

一、历史渊源与军事防御功能

（一）碉楼寨堡的起源与分布

巴蜀少数民族碉楼寨堡起源与西南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相关。地理上，巴蜀多山多水提供天然防御屏障；历史上，社会动荡是建设直接诱因。今川东北地区地理复杂，明清时社会动荡频发，鄯蓝之乱、明末清初战乱、白莲教与李蓝起义影响显著。

碉楼寨堡分布有地域和民族特色。川东北有南江惠民寨等明清寨堡代表；川西高原有藏羌民族碉楼集中分布区，如丹巴碉楼等。这些寨堡建于险峻山脊或交通要道，遵循“据险自守”原则。

（二）军事防御体系的构建

碉楼寨堡军事防御功能通过立体防御体系实现，由线性街巷、碉房层面和点状碉楼构成。以桃坪羌寨为例，其有多层次防御结构，能应对不同规模军事冲突。

寨堡防御功能还体现在建筑细节。碉楼墙壁为土夯墙，底层厚，俗称“狮子头”，往上墙体厚度递减，确保结构稳固。土碉结构设计围绕防御展开，使其成为坚固堡垒，在冷、热兵器时代均有防御优势。

（三）不同时期的防御特征演变

从明中后期至清末，寨堡防御特征随战争形态和技术水平演变。川东北地区寨堡寨门由拱券式变为平顶式，寨墙砌筑由丁砌为主变为顺砌为主，体现建筑技术进步和对防御效率的追求。

明中后期至明末，民间自发修寨堡自卫；清代中后期，朝廷介入修建并与团练结合，形成新防御模式，为李蓝起义等提供防御策略。这标志着寨堡从民间自卫设施向官方军事体系整合，防御功能从分散自我保护发展为区域协同防御。

二、形制结构的演变历程

（一）明清时期的形制特点

明清时期是巴蜀少数民族碉楼寨堡形制定型与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由于社会动荡频繁，寨堡建设达到了一个高潮。寨堡的形制主要受民族传统、地理环境和防御需求三重因素影响。

在川东北地区，寨堡多采用石质结构，整体布局注重与地形的结合。寨墙的砌筑方式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明中后期以丁砌为

主，清代则逐渐转变为以顺砌为主。寨门的形制也经历了从拱券式向平顶式的演变，这一变化可能与施工效率和经济性考量有关。这些寨堡，或由官府修建，或供军队驻扎，或由宗族、乡里共同修建。同时，还存在许多“贼”寨，有的由贼匪自行修建，有的则是从百姓手中抢夺而来。

在川西高原，藏羌民族碉楼有独特建筑风格。羌族碉楼营造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贾学友用锤子、凿子将石头制成片状石材，指导孩子们搭建碉楼，该技艺体现对当地材料的熟练运用。藏羌碉楼营造程序含选址、选材、打地基、砌墙、内部设计和封顶等环节，各环节有严格技术要求，如“收脉”、“加“墙筋”“鱼脊背”等特殊技艺，保障了碉楼稳固耐久。

（二）近现代的形制变迁

清末至民国时期，随着火器的普及和社会秩序的变化，碉楼和寨堡的形制开始发生明显转变。例如，在贵州，碉楼的修筑始于清乾嘉时期，发展于咸同时期，并在民国时期达到繁盛，与当地战事、匪患以及防御习惯有着密切关联。一方面，传统的防御性建筑逐渐失去军事价值；另一方面，新建的碉楼更多考虑居住舒适性和功能性。

在凉山州越西县中所镇陶家营村，土碉楼的设计既保留了防御功能，又兼顾了居住需求。85岁的村民李文清与老伴栖居的土碉楼，已历经140余载春秋，其墙体以厚实的夯土筑就，底层最厚处逾一米，二、三、四层自下而上逐层递减，如此设计既减轻了重量，又使房屋结构稳固如磐。这般设计，既保障了防御之能，又兼顾了结构之合理。

值得注意的是，近现代传统碉楼开始与现代建筑元素结合。在陶家营村，陈明家碉楼内部焕然一新，有光洁瓷砖地板、精致吊顶，冰箱、洗衣机等电器齐全。这种传统外观与现代内饰融合，体现了碉楼从防御之所向宜居空间的转型。

（三）当代的形制创新与符号化

当代，随着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增强和旅游业的发展，碉楼寨堡的形制进一步走向符号化和审美化。于保护与开发之进程中，碉楼寨堡的形制常常被凝练为文化符号，融入各类建筑与景观设计之中。

桃坪羌寨，作为千年古堡和活态博物馆，位列世界遗产预备名录，是国家级文保单位。在保护老寨原真性的同时，当地政府和湖南省对口援建了新寨，以促进旅游开发。桃坪羌寨的保护和开发策略遵循了“老寨重保护，新寨搞开发”的原则，旨在实现

传统村落的合理利用与可持续发展。新寨的建筑虽然采用了传统的羌族元素，但其形制更符合现代功能需求，体现了传统形制的当代转译。

碉楼寨堡的形制也被应用于文化展示和艺术创作中。在桃坪羌寨的“古羌文化体验基地”，贾学友和他的女儿搞起了研学，用碉楼模型向孩子们展示羌族碉楼的营造技艺。这种微缩化的形制呈现，让碉楼从实用建筑蜕变为教育媒介，实现了其形制功能的又一次华丽转身。

三、功能转型：从军事防御到文化符号

（一）功能转型的动因

巴蜀少数民族碉楼寨堡功能转型的动因可归纳为三个方面：社会环境变化、经济模式转型和文化价值重构。

社会环境的变迁，成为功能转型的深层动因。随着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地区冲突减少，碉楼寨堡的军事防御功能自然衰退。与此同时，传统村落的人口结构也发生变化，年轻一代外出务工，导致许多寨堡无人居住和维护，功能日渐式微。

经济模式转型是功能转型的直接推动力。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旅游业跃升为巴蜀地区的支柱产业，碉楼寨堡作为独特的文化瑰宝，被融入旅游开发体系之中。在桃坪村，九成村民投身于旅游业或相关领域，端起了“旅游饭碗”。这种经济模式的转变为碉楼寨堡的功能转型提供了持续动力。

文化价值重构是功能转型的内在逻辑。随着传统文化复兴与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巴蜀碉楼作为山地特色民居建筑，其区域历史文化、自然环境交互作用影响下积淀形成的文化价值得到凸显。碉楼寨堡从实用的防御建筑转变为民族文化象征，完成了从物质功能到文化意义的功能转型。

（二）功能转型的路径与表现

碉楼寨堡的功能转型呈现出多元路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防御设施到居住空间的转型。在许多地区，碉楼寨堡虽然保持原有建筑形制，但其功能已转变为日常生活空间。在越西县陶家营村，李文清老人对土碉楼的评价是“冬暖夏凉”，家里的腊肉不用放在冰箱也不会坏。这种日常生活的融入，使碉楼从非凡性的防御设施转变为平常性的居住空间。

从实用建筑到文化遗产的转型。2007年，桃坪羌寨被评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一身份的转变，标志着碉楼寨堡从实用建筑提升为文化遗产，其价值重心从使用价值转向历史文化和象征价值。

从物质实体到文化符号的转型。碉楼寨堡的形象被广泛应用于品牌建设、艺术创作和地方认同构建中。在桃坪羌寨，运营方希望打造出专属于桃坪的IP。这种符号化过程使碉楼寨堡超越了物质实体，成为可迁移、可传播的文化符号。

（三）功能转型的多元模式

依据不同地区的实践情况，碉楼寨堡的功能转型呈现出多种模式，主要涵盖以下方面：

活态保护模式。于桃坪羌寨，构建起“老寨重保护，新寨搞开发”的模式。老寨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着重保持其原真性；新寨则承担旅游服务功能，二者相互补充，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文旅融合模式。在越西县陶家营村，当地规划“将土碉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底色，全力塑造‘陶家营十八碉’品牌形象，让土碉成为陶家营乡村旅游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通过引入骑行道、步行道、桃园等旅游设施，碉楼成为乡村旅游的核心资源。

研学教育模式。在桃坪羌寨，贾学友父女开展了研学活动，教导孩子们搭建碉楼。该模式将碉楼营造技艺转化为教育资源，实现了文化遗产与教育的双重功能。

四、保护与利用的现实路径

（一）保护现状与挑战

巴蜀少数民族碉楼寨堡的保护现状呈现出喜忧参半的态势。一方面，部分知名寨堡如桃坪羌寨已获得较高水平的保护与利用，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入选世界“最佳旅游乡村-2”；另一方面，大量地处偏远地区的碉楼寨堡仍面临自然损毁、人为破坏甚至消失的风险。

碉楼寨堡保护面临的主要挑战如下：

自然破坏。绝大多数碉楼寨堡为土石结构，长期遭受风吹雨打，致使墙体损坏严重。在越西县陶家营村，一座拥有300多年历史的土碉楼，“夯土墙面已坑洼不平，尽显岁月沧桑”。自然损耗是碉楼寨堡普遍面临的一大问题。

保护与开发的矛盾。在桃坪羌寨，文物保护的相关规定严格，任何修建活动都需经过复杂的审批流程。例如，桃坪羌寨文物建筑灾后抢险维修工程的批复显示，维修工程需同步进行清理、设计、施工，并且单项工程维修设计方案需由相关部门批准后实施。尽管电网、水网、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升级是必要的，但这些审批过程往往难以通过。严格的保护要求虽有利于保持文物的原真性，但也限制了其基础设施的改善与合理利用。

随着碉楼寨堡旅游开发的推进，部分地区出现了过度商业化和表演化的倾向，导致传统文化内涵被简化、曲解，丧失了原有的历史深度与文化底蕴。例如，开平碉楼与村落的旅游资源开发中，存在旅游产品缺乏特色、同质化现象严重等问题，这不仅影响了游客的体验，也对当地的文化遗产与发展构成了挑战。

（二）系统性保护策略

针对碉楼寨堡的保护需求，应实施系统性保护策略，具体包括：

数字化存档。运用现代测绘、摄影和三维建模技术，对碉楼寨堡进行全面记录，建立数字档案。此方法可借鉴季富政教授的经验，他在几十年间百余次带领学生深入人迹罕至的羌寨碉楼，以手绘方式抢救性记录了大量建筑资料。当代技术可为这一工作提供更为高效、精确的手段。

分级保护体系。依据碉楼寨堡的历史价值、保存状况和特色，构建分级保护体系，采取差异化保护措施。对于具有突出价

值的碉楼寨堡，应申报更高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对于一般性碉楼，则可采用以用促保的策略。

生态博物馆建设。借鉴生态博物馆理念，对碉楼寨堡及其周边环境实施整体性保护。这一理念与季富政所提出的“传统民居绝非孤立的物理存在，而是构成一个精密的‘山水—人—神’共生的文化生态系统”的观点相契合。通过实施整体保护，能够维系碉楼寨堡与自然环境及人文背景之间的有机联系。

（三）活态利用路径

保护与利用并非相互对立，通过活态利用，碉楼寨堡能够在当代社会焕发新的活力。活态利用的主要途径包括：

桃坪羌寨通过文旅融合发展，将碉楼寨堡的文化价值与旅游开发相结合，成功打造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例如，运营方计划将羌绣、羌笛、羊皮鼓舞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相结合，推出观光游、文化游、研学游等多元化的旅游产品。这些产品不仅满足了不同游客的需求，还提升了旅游体验的质量。据资料统计，今年1至10月，桃坪羌寨接待游客12.6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255.42万元，带动全镇旅游收入约1.2亿元。

文化创意产业。提炼碉楼寨堡的文化元素，开发文化创意产品，延伸文化产业链。这一思路在碉楼寨堡的符号化过程中已有所体现，未来可进一步向系统化、规模化方向发展。

社区参与保护。鼓励当地社区参与碉楼寨堡的保护与利用，

构建利益共享机制。在越西县陶家营村，该村已成立陶家营桃乐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让村民通过土地流转、资金注入等方式入股，明确分红机制，保障村民利益。这种社区参与模式可以增强居民的保护动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五、结语

巴蜀少数民族碉楼寨堡从军事防御到文化符号的转型，是一个从实用功能向文化意义、从物质实体向符号表征转变的复杂过程。这一转型不仅反映了建筑本身功能适应性的变化，更体现了社会变迁、文化重构和价值重塑的深层逻辑。

从当代视角来看，碉楼寨堡的保护与利用应摒弃单一的静态保护模式，转而采取多元化的活态利用策略。正如碉楼寨堡在历史上不断适应环境变化而调整其形制与功能一样，当代的保护也应注重与现代社会需求的对接，使其在文化遗产、乡村振兴和民族认同构建中发挥新的作用。

未来，随着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深化和技术的进步，巴蜀少数民族碉楼寨堡有望在形制保护与功能重构之间寻得更佳平衡点，实现从历史文化载体到当代文化资源的成功转化，为巴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参考文献

- [1] 关勇. 寨堡为“媒”：宋代西南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内在逻辑探析[J]. 广西民族研究, 2025, (02): 156-164.
- [2] 倪珂, 赵月苑. 中国古代区域性城镇防御体系营建历程分析——以南宋晚期巴蜀城寨堡为例[J]. 重庆建筑, 2024, 23 (06): 5-9.
- [3] 舒莺, 刘志伟. 巴渝地区碉楼建筑历史演变与保护利用[J]. 重庆社会科学, 2018, (10): 123-132. DOI:10.19631/j.cnki.css.2018.010.013.